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会计政策选择： 基于资产减值会计的分析

张海平, 吕长江

(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文章基于资产减值会计的视角,研究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我们发现:从盈余管理动机的角度看,股权激励影响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在股权激励方案推出前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管理层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利用资产减值政策操纵会计盈余影响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研究表明,部分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管理层利用资产减值政策操纵会计盈余推动股权激励方案的顺利实施,为自己谋利。文章的研究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监管层进一步完善会计监管和股权激励制度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股权激励;会计政策选择;资产减值

中图分类号:F275;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1)07-0060-11

一、引言

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和高管股权激励均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资产减值会计是稳健计量模式的重要体现,是对企业部分经济业务所面临的不完全成熟外部市场的反映。国内外大量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既有经济因素动机,也有盈余管理动机。

股权激励是公司股东与公司高管之间的利益分配契约,研究发现以盈余为基础的高管报酬会产生盈余管理的动机。Watts等(1986)还发现高管会利用会计准则的不完全性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操纵。那么,高管股权激励是否成为资产减值新的盈余管理动机?我们以资产减值率作为衡量国内股权激励公司的资产减值计提情况,发现股权激励方案推出前后资产减值分布呈现一种特殊的规

收稿日期:2011-04-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872022);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06JA630016);上海市哲学社会基金资助项目(2008BJB021)

作者简介:张海平(1975—),男,浙江宁波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

吕长江(1965—),男,山东日照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律。以新湖中宝为例,公司 2008 年推出股权激励方案,方案推出上年资产减值率为 13.5%,较方案推出前第二年的-67%增长近 80 个百分点,而股权激励方案推出当年资产减值率仅 5.8%,方案推出次年的减值率也仅有 0.27%的水平。股权激励影响了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计提吗?反之,资产减值是否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途径从而影响股权激励制度的效用?值得关注的是,我国 2006 年新出台的资产减值准则已关闭长期资产减值可以转回的大门,旨在抑制和防范企业通过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那么,准则实施是否实现了预期的目标?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讨研究,以期为公司和监管部门提供参考。

股权激励的目的在于激励经营者为企业价值最大化而努力工作,从而减少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Smith 和 Watts,1982)。但由于契约本身的不完备性和经理人工作的难计量性,经理人员可以通过影响和改变会计盈余来影响收益分配,以使契约的签订和履行更加有利于自己(Schipper,1989),即报酬契约容易使高管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进行盈余管理(Hagerman 等,1979)。国内学者王克敏等(2007)发现,高管报酬与盈余管理正相关。肖淑芳(2009)发现,管理层利用“操纵性应计”影响股权激励方案的制定。国内外关于盈余管理研究非常丰富,但在具体准则层面研究盈余管理的却并不多见,本文以资产减值会计的视角研究股权激励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从会计准则的制度设计看,资产减值是上市公司一项重大的会计政策选择,通过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反映公司因业绩低下、同行业竞争以及经营策略转变导致的资产价值下降,以全面、公允地反映企业资产的现时价值状况,揭示潜在风险,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正确决策提供相关信息。但资产减值会计的计量却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不仅需要大量的外部信息,还需要专业人士准确的职业判断,资产减值计量的不确定性使得资产减值成为部分公司盈余管理的工具(Francis 等,1996),国内部分上市公司频频发生的“大清洗”、利润平滑就是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例证。综合目前国内外研究,尚未有学者从资产减值角度研究股权激励公司高管基于自利因素进行的会计政策选择。^①

本文以 2006—2009 年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为样本,对比分析了股权激励公司方案推出前后资产减值率资料。分析发现,在股权激励方案推出前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率呈现不同的分布:激励方案推出前一年,股权激励公司的资产减值率显著高于非股权激励公司;激励方案推出当年及下一年,股权激励公司的资产减值率又显著低于非股权激励公司。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我们发现,股权激励成为新的盈余管理动机影响了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进一步研究发现,具有福利性质的股权激励公司对资产减值政策的影响更显著。本文研究表明,部分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管理层利用资产减值政策操纵会计盈余,使得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对自己更有利。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进行理论分析和文献回顾,并提出假设,第三

部分是实证研究,第四部分为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和局限。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赋予管理层一定的股权可以缓解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Stulz, 1988),减少代理成本。但股权激励内在效用机制的发挥还需要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成熟的股票市场定价机制,以及合理有效的股票期权方案等条件的配合。国外研究发现,在制度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管理层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收益费用递延等方式进行盈余管理,以有利于股权激励方案的顺利进行。Skinner 和 Myers (2000)发现,管理层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后会进行盈余管理以实现连续的业绩增长。Eli Bartov 等(2004)发现,公司管理层利用内部信息进行盈余管理,导致股票期权行权前后盈利水平有非正常的表现,行权后公司盈利水平下降实质是行权前公司非正常盈利的转回。尽管目前国内研究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成果较少,但从国外研究结果看,盈余管理对股权激励制度实施影响较大,制度设计不合理、内外部监督缺位将削减股权激励的效用。

股权激励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背后原因是股权激励本质上是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一种基于会计盈余数据基础上的报酬契约,由于会计盈余直接影响高管期权的获得和行权收益,盈余管理就成为部分治理存在缺陷的股权激励公司高管自谋福利的途径。但实际上,盈余管理是借助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变更来实现的,而会计准则的局限恰恰给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应计制会计中的预计、摊销、折旧、计提等都很容易成为盈余管理的工具。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明显放大了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处理的空间,企业在制定股权激励方案时必然充分考虑会计政策变更或调整的影响,那么,上市公司高管是否存在利用新会计准则赋予的会计政策选择权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具体途径又是什么呢?

我国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体系仅有几处与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存在差异,资产减值准则就是其中一项,因而在整个会计准则体系中尤其引人关注。我们关注股权激励公司的资产减值情况,发现一些公司资产减值在股权激励推出前后呈现某种规律,如新潮中宝在股权激励方案推出前后,资产减值率发生明显变化,那么资产减值是否成为股权激励公司操控盈余以有利于股权激励方案按符合高管自身利益的方向顺利实施呢?从资产减值会计特性和我国资产减值会计发展的规律看,这种假设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可能性。

首先,从资产减值会计特性看,资产减值是一项技术难度大、职业判断要求高、主观因素较强的会计核算工作。本质上,资产减值会计是会计稳健性原则的重要体现,但稳健性原则的正确运用却有赖于会计专业人员的职业判断,职业判断差异或稳健性有可能成为蓄意多计提或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借口。况且资产减值除采用现行市价、现行成本等计量属性外,还采用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计量属性,现金流量、折现率和年限估计差异直接决定估计结果

的非唯一性,而客观上存在的这种减值弹性也使得公司能够根据需要随意确定各项准备的计提方法和比例,而审计和监管部门却很难找到有说服力的理由进行干涉。况且,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不确定事项越来越多,对这些不确定的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的正确判断非常不容易,这样就给管理层留下了更大的主观判断空间,从而为其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温床。

其次,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资产减值确实沦为部分上市公司不同目的下盈余管理的工具。McNichols 等(1988)以操纵性坏账准备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利润较高或较低时公司都会计提较高的坏账准备,表明公司有平滑和大清洗动机。Zucca 和 Campbell(1992)发现大多数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司都有平滑盈余的动机。我国资产减值情况也不例外,我国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经历了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然而,自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一些上市公司却利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戴德明等,2005;王建新,2007),严重损害了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代冰彬等(2007)发现盈余管理的不同动机会影响资产减值类型的选择。

再次,新会计准则的局限性仍为股权激励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操控盈余提供了可能。为遏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2006 年颁布的新《资产减值》准则规定长期资产减值 2007 年之后不得转回,在股权激励制度背景下,新资产减值会计就能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吗?实际上,从资产减值准则本身和制度设计出发,尽管取消了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但资产减值会计从根本上杜绝盈余管理行为却难度很大。一是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的利益往往与一定的业绩指标相联系,而会计数字则是管理层薪酬或激励契约签订的重要依据,代理人利用盈余管理来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动机犹存。二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减值主要是流动资产的减值,绕开了新准则长期资产减值不得转回的规定(谭燕,2008)。三是新会计准则下,资产减值技术要求高、主观性强的特点没有改变,较高的职业判断要求仍可能被有动机的公司高管滥用。

那么,国内进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高管是否会利用资产减值会计进行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盈余管理呢?肖淑芳等(2009)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三个季度,经理人通过“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公告日后盈余存在反转现象。本文拟通过我国股权激励和非股权激励公司的对比,重点考察股权激励和资产减值的关系。

从股权激励的情况看,对高管利益影响最大的是股票期权授予、行权条件和行权价格的制定。前者决定管理层是否能够得到激励,后者则决定管理层获得激励需要付出的成本。首先从股票期权授予、行权条件分析。从目前公布股权激励方案的公司看,大多数公司仍以年度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作为授予、行权条件,且股权激励方案中的股票期权获授条件仅以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中的基本条件作为标准。基于会计准则

本身存在的限制和契约的不完善,管理层为获得更有利的行权条件,有动机在方案公布前和行权前进行盈余管理,向下做低利润,而做高资产减值损失是降低即期会计盈余的一个有效手段。其次从行权价格分析。从国外的经验看,公司为了得到最优的行权价格可能会进行盈余管理,或者通过披露不好的信息打压股价,从而取得较好的行权价格。实质上,行权价格的高低,直接决定高管获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成本,因此,公司高管有动机通过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从而影响行权价格的制定。从资产减值会计角度看,股权激励方案推出前一个会计期间,股权激励公司有动机增加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以调低会计盈余。综上,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方案推出前一年,股权激励公司的资产减值损失率大于非股权激励公司。

股权激励方案公布是一个分水岭,股权激励方案公布前,公司的业绩关系到授予、行权条件和行权价格的制定,因此公司有提高资产减值损失从而降低会计盈余的动机。而股权激励方案公布当年及以后,情况则正好相反。Skinner 和 Myers (2000)发现,管理层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后会进行盈余管理以实现连续的业绩增长。原因在于,首先,股权激励方案公布当年往往是高管股票期权能否授予的第一个考核年,需要将当年的业绩指标与基年相比,为获授股票期权,高管有动机努力达到股票期权授予标准。其次,越来越多的股权激励公司选择了分次授予分次行权的股权激励方案,由此决定了激励方案推出后的若干年公司业绩都将直接影响高管股票期权的授予和行权,因此有动机向上进行盈余管理。这样,公司管理层既可以持续获得分步实施的股票期权,又可以通过提高盈余促使股价有好的表现,从而提高行权收益。由此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股权激励推出当年和次年,股权激励公司的资产减值率小于非股权激励公司。

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

本文研究国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资产减值会计的影响。我们选择2006年1月1日至2009年底的股权激励公司为样本数据,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日至2009年底的股权激励公司。截至2009年底,我国共有136家上市公司推出了股权激励方案。同时,受金融危机影响,上市公司股价大幅波动,有79家公司中止了股权激励方案,我们在分析中予以剔除。因此,我们的股权激励公司样本实际为61家。股权激励样本数据和财务数据来自Wind和CSMAR数据库。使用的统计软件为SAS for windows 9.0。

本文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中剔除了以下几类公司:(1)金融类公司;(2)当

年实施再融资公司，为避免再融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剔除当年和前三年的数据；(3)当年亏损上市公司，以避免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大洗澡的影响；(4)当期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小于 100 万元，或者 ROE 处于 $(0, 0.02]$ 的微利公司，以避免上市公司为规避亏损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影响；(5)ST 公司；(6)当年度审计意见不清洁公司，即当年被会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公司。

(二)模型

本文用资产减值率代表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相对规模。资产减值率是指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占当期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重，反映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总体水平，该指标时间参数为“年度”。本文用 JZL 代表资产减值率。我们参考代冰彬等(2007)和王建新(2007)的相关研究，设计本文的假设模型：

$$JZL = \alpha + \beta_1 SIZE + \beta_2 EPS + \beta_3 CFO + \beta_4 LEV + \beta_5 BIG1 + \beta_6 \Delta SALE + \beta_7 \Delta E + \beta_8 LZZZ + \beta_9 GZZZ + \beta_{10} CHANGE + \beta_{11} OPTION + \epsilon$$

模型中的变量定义为：JZL 表示资产减值率；SIZE 表示资产的自然对数，代表企业规模；EPS 表示每股收益；CFO 表示每股经营性现金流量；LEV 表示资产负债率；BIG1 表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Delta SALE$ 表示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期初总资产； ΔE 表示减值前净利润的变动/期初总资产；LZZZ 表示流动资产周转率；GZZZ 表示固定资产周转率；CHANGE 表示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变更时为 1，否则为 0；OPTION 表示股权激励公司，激励时为 1，否则为 0。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描述性统计的数据分析(见表 1)，2006—2009 年，推出方案前一年(N-1 年)，股权激励公司的资产减值率为 0.33，大于非股权激励公司 0.11 的水平，说明股权激励公司有动机在方案推出前一年通过增加资产减值损失向下操控盈余，从而取得对高管有利的行权条件和行权价格。方案推出当年(N 年)，股权激励公司为顺利获授股票期权，有动机以减少资产减值损失的方式向上操纵盈余。如表 1 所示，N 年股权激励公司的资产减值率为 0.12，小于非股权激励公司资产减值率 0.19 的水平。第 N+1 年，股权激励公司的资产减值率为 0.13，而非股权激励公司的资产减值率为 0.24。股权激励公司减值率小于非股权激励公司的原因，一是由于目前大部分公司采用分批授予、分次实施的股票期权激励方案，因此，N+1 年高管依然有动机向上操纵盈余，以满足授予条件；二是 N+1 年为等待期，一般公司业绩达到激励指标，高管才有资格行权，因此，这些公司也有动机减少资产减值损失，从而向上操纵盈余以满足行权条件。我们将 N 和 N+1 年合起来作为一个横截面资料分析，结论一致。

进一步，我们按 N-1 年、N 年、N+1 年，即股权激励方案推出上年、当年及次年作为计算基准，逐年对比分析了激励公司和非激励公司资产减值率数据，结果亦相同。

表 1 2006—2009 年股权激励与非股权激励公司方案推出前后减值率特征分析

项 目	年 份	N-1 年	N 年	N+1 年	N 和 N+1
均值	股权激励公司	0.33	0.12	0.13	0.12
	非股权激励公司	0.11	0.19	0.24	0.21
t 值 ^②		-1.71**	2.82***	3.12***	4.13***
中位数	股权激励公司	0.07	0.05	0.04	0.04
	非股权激励公司	0.03	0.06	0.06	0.06
Z 值(单尾)		2.61***	-0.50	-1.68**	-1.68**
N	股权激励公司	38	64	52	116
	非股权激励公司	2 685	3 147	2 170	5 317

资料来源:WIND 数据库。*、** 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四)实证分析

我们以 JZL 为因变量,依次对两个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 假设 1 和假设 2 的回归结果

年度	N-1		N 和 N+1	
因变量	JZL		JZL	
自变量	Beta	T 值	Beta	t 值
Intercept	-0.05	-0.27	-0.22	-1.32
SIZE	0.03	1.45	0.04**	2.24
EPS	-0.24***	-8.28	-0.31***	-13.25
CFO	0.01	0.94	0.03***	2.82
LEV	0.13**	2.29	0.26***	5.25
BIG1	-0.11*	-1.82	-0.17***	-3.20
ΔSALE	0.02	0.81	-0.04	-1.53
ΔE	-0.24	-1.60	-0.04	-0.33
LZZZ	0.006	1.08	0.002	0.41
GZZZ	0.000008	0.02	0.0007	1.34
CHANGE	0.03	1.62	0.03*	1.95
OPTION	0.16***	2.64	-0.09*	-1.78
F 值	8.81		19.90	
N	1964		4482	
Adj. R ²	0.09		0.10	

注:为节省篇幅,表中的年度、行业哑变量略,下表同。

由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资产减值率为因变量的情况下,第 N-1 年 OPTION 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第 N-1 年推出股权激励方案公司相对于非股权激励公司,更倾向于增加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向下操控盈余,以有利于管理层 N 年股权激励方案的制定。

因 N 年和 N+1 年管理层通过资产减值操控盈余的动机和方向一致,本文将第 N 年和 N+1 年的数据合并,构成一个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上述回归结果发现,第 N 年和 N+1 年 OPTION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管理层为获授股票期权或行权动机,更倾向于减少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向上操控盈余,以顺利实现股权激励收益。

四、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可靠,我们主要做了如下三组稳健性检验:首先,我们用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FLASS)作为主变量,分析其与资产减值率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3)显示,FLASS与JZL显著正相关,说明流动资产多的上市公司越倾向通过减值计提影响盈余,与王建新(2007)和谭燕(2008)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表 3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年度	N-1		N 和 N+1	
因变量	JZL		JZL	
自变量	Beta	t 值	Beta	t 值
Intercept	-0.22	-1.04	-0.39**	-2.27
SIZE	0.04*	1.92	0.05***	2.76
EPS	-0.25***	-8.41	-0.33***	-13.92
CFO	0.02	1.32	0.04***	3.35
LEV	0.12**	2.18	0.24***	4.91
BIG1	-0.12**	-2.06	-0.18***	-3.30
ΔSALE	0.01	0.45	-0.05**	-2.05
ΔE	-0.20	-1.35	-0.007	-0.05
LZZZ	0.01*	1.72	0.010	1.63
GZZZ	-0.0002	-0.48	0.0002	0.33
CHANGE	0.03	1.61	0.03**	2.01
FLASS	0.11**	2.03	0.17***	3.52
WEL			-0.27**	-2.43
F 值	8.68		20.31	
N	1964		4 482	
Adj R ²	0.09		0.10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股权激励公司和非股权激励公司流动资产占比和流动资产减值占比(见表4),发现无论是N-1年,还是N年和N+1年,股权激励公司FLASS的均值都大于非股权激励公司,而且均值和中位数检验显著。我们继而观察了流动资产减值,发现情况迥异,N-1年股权激励公司的流动资产减值大于非股权激励公司,而N年和N+1年流动资产减值却显著小于非股权激励公司,这和高管股票期权授予和行权有关系,与前面的发现一致。

其次,我们分析了激励、福利公司资产减值率(WEL,福利公司为1,否则为0)的计提结果。由于N-1年的数据较少,我们重点分析了N年和N+1年的数据。福利型激励型公司的划分我们参考了吕长江等(2009)的文章,该文中有三种分类方法,我们对三种分类方法均做了计算,结果发现WEL项系数均为负值。表3列示了第三种^③分类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WEL的系数显著为负。由于公司为福利型时WEL取1,回归结果说明相对于激励型公司,

表 4 是否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流动资产占比及对应减值均值和中位数比较

项 目	年 度	公 司 类 别	均 值	t 值	中 位 数	z 值
流动资产占比	N-1	股权激励公司	0.65	-4.76***	0.65	2.95***
		非股权激励公司	0.53		0.54	
	N 和 N+1	股权激励公司	0.58	-3.20***	0.61	2.86***
		非股权激励公司	0.52		0.52	
流动资产减值占比	N-1	股权激励公司	0.86	-0.74	0.20	-0.98
		非股权激励公司	0.65		0.24	
	N 和 N+1	股权激励公司	0.49	6.60***	0.17	-2.86***
		非股权激励公司	1.24		0.30	

N 年和 N+1 年福利型公司更倾向于减少资产减值计提以满足激励条件。

第三,我们以 ROE 作为刻画上市公司盈利的主要指标,对比股权激励方案推出前三年公司盈余变化情况(见表 5),结果发现 2006—2009 年,N-1 年推出股权激励方案公司的 ROE 较前两年同比平均数要低,这说明股权激励公司 N-1 年通过资产减值已实际降低了会计盈余,从而降低激励条件的目的。

表 5 2006—2009 年股权激励公司方案推出前三年 ROE 数据分析 单位:%

ROE\分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合 计
N-1	12.89	11.94	12.51	13.23	12.77
N-1 前两年均值	15.13	15.35	12.89	18.24	14.87
t 值(单尾)	1.06	0.14	0.36	1.24	-1.41*

由上述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流动资产越多的公司,因绕开了新会计准则有关长期资产减值不得转回的规定,倾向于通过资产减值影响业绩,而股权激励则成为新的盈余管理动机影响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同时,我们发现具有福利特征公司的管理者更有能力通过会计政策影响公司盈余,以采取对自己更有利的资产减值政策,而通过对比推出股权激励公司前三年的 ROE 数据发现,股权激励公司通过资产减值已达到了调控会计盈余的目的。

五、结 论

本文基于资产减值会计的视角,研究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我们发现从盈余管理动机的角度看,股权激励影响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在股权激励方案推出前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管理层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利用资产减值政策操纵会计盈余影响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公司资产减值率呈现不同的分布:激励方案推出前一年,股权激励公司的资产减值率显著高于非股权激励公司;激励方案推出当年和次年,股权激励公司的资产减值率又显著低于非股权激励公司。进一步研究发现,具有福利性质的股权激励公司对资产减值政策的影响更显著。本文研究表明,部分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管理层利用了资产减值政策操纵会计盈余推动股权激励方案的顺利实施,为自己谋利。

本文对已有文献的发展和研究意义在于:第一,股权激励公司高管有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股权激励是影响 A 股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二,本文的研究为国内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途径并非仅限于应计操控角度,资产减值计提等具体会计政策选择也是盈余管理的途径之一,而在新资产减值准则下,上市公司流动资产占比高为公司继续通过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第三,新资产减值准则抑制盈余管理的制度设计效果因为上市公司流动资产减值实际占比高而被削弱,本文也为上市公司在新会计准则下的盈余管理提供了间接证据。第四,从激励、福利公司角度研究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影响。同时,我们的研究还为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和股权激励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的局限在于:一是剔除股权激励中止方案公司后,样本数据有限,可能影响数据分析结果;二是本文研究了股权激励背景下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成为新的盈余管理手段,但并未涉及其他盈余管理的动机和因素;三是本文未系统研究股权激励行权公司对资产减值计提的影响,这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注释:

- ①资产减值政策是公司自主决定的一项重要会计政策,但计提金额或比例又是一项会计估计,本文为行文方便将资产减值统一认定为公司的一项会计政策选择。
- ②因样本数据不对称,均值 t 检验和中位数 Z 检验均以单尾表示。
- ③其他两种分类方法 WEL 回归系数为负,但是 t 值不显著。

参考文献:

- [1]王克敏,王志超.高管控制权、报酬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7):111—119.
- [2]吕长江,郑慧莲,严明珠,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设计:是激励还是福利?[J].管理世界,2009,(9):133—147.
- [3]戴德明,毛新述,邓瑋.中国亏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行为研究[J].财经研究,2005,(7):71—82.
- [4]王建新.公司治理结构、盈余管理动机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7,(5):60—66.
- [5]代冰彬,陆正飞,张然.资产减值:稳健性还是盈余管理[J].会计研究,2007,(12):35—42.
- [6]刘玉廷,戴德明.资产减值会计——会计准则研究文库[M].大连:大连出版社,2005.
- [7]谭燕.资产减值准备与非经常性损益披露管制[J].管理世界,2008,(11):129—142.
- [8]肖淑芳,张晨宇,张超,等.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的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2009,南开管理评论,(4):113—119.
- [9]Chen C, J S Chen, X Su, et al. Incentives for and consequences of initial voluntary asset write-downs in the emerging Chinese marke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Research, 2004, 3(1): 43—61.
- [10]Bartov E, Mohanram P. Private information, earnings manipulations, and executive

- stock-option exercise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4,79(4):889—920.
- [11]Hagerman Robert L,Zmijewski Mark E.Some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accounting policy choi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1979,1(2):141—161.
- [12]McNichols M,P G Wilson.Evidenc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from the provision for bad debt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88,26,1—31.
- [13]Stulz R M.Managerial control of voting rights:Financing policies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8,20:25—54.
- [14]Schipper K.Commentary on earnings management[J].Accounting Horizons,1989,3(4):91—102.
- [15]Warfield Terry D,Cheng Qiang.Equity incentiv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5,80(2):441—476.
- [16]Yermack D.Good timing:CEO stock option awards and company news announcements[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7,52:449—476.
- [17]Zucca L,Campbell D.A closer look at discretionary write downs of impaired assets[J].Accounting Horizons,1992,(6):30—41.
- [18]Smith Jr,Clifford W,Watts Ross L.Incentive and tax effects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plans[J].Austral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1982,7(2):139—157.

Stock Option Awards and Accounting Policy Choices: Analysis Based on Asset Impairment Accounting

ZHANG Hai-ping, LV Chang-ji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stock option awards on corporate accounting policy choice from the angle of asset impairment accounting. It finds that stock option awards affect corporate accounting policy choice from the angl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issue of stock option awards plan, managers manipulate earnings by asset impairment policy to affect the vesting conditions of stock option on behalf of themselves. Furthermore, it shows that the managers in some company with stock option plan applies asset impairment policy to manipulate earnings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ock option plan for their own interest. It provides new analytical angle for the motivation of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helps to improve accounting regulation and stock option awards.

Key words: stock option award; accounting policy choice; asset impairment

(责任编辑 金 澜)